

■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研究

《中国在梁庄》：“外来者”视域下的乡村想象

景兴燕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119)

摘要:“外来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经典的人物类型,以写作《中国在梁庄》而闻名的梁鸿之于梁庄便是一个“外来者”。经过这一视域的过滤,梁庄成为“外来者故事”中阐释现代与传统、外来与本土、城市与乡村等问题的“最佳话语场”;成为通过“这一个”的病灶式呈现,反映当下中国转型期众多乡村现实的“被剪裁的样本”;成为交织着民间同情立场和理性批判精神、叠加着启蒙烛照和感性宣泄的满是裂隙的“乡村想象”。

关键词:梁庄;外来者;乡村想象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70X(2020)04-0120-05

PDF获取: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20.04.019

China in Liangzhuang: Rural Imagi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utsiders"

JING Xing-y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Outsider" is a classic character typ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Liang Hongzhi, who is famous for writing "China in Liangzhuang", is an "outsider". Through the filter of this horizon, Liang zhuang has become the "best discourse field" in "the story of the outsider" to explain modern and traditional, foreign and native, urban and rural issues, and the focus presentation through "this one", the "tailored sample", which reflects the reality of many villages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China, has become a "village imagination" full of rifts interwoven with folk sympathetic stand and rational critical spirit, superimposed with enlightenment candle light and emotional catharsis.

Keywords: Liangzhuang; outsider; rural imagination

《中国在梁庄》2010年刊登于《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学者梁鸿在书中以人类学、社会学方法为经,以田野调查和人物实录为纬,围绕故土——河南梁庄,描绘出一幅社会转型期斑驳杂芜的乡村图景。该书不仅入围当年各类文学刊物“好书”大奖,成为梁鸿从书斋学者向非虚构作家转型之作,而且亦赢得学界“不曾认识农村,何以认识中国”(李敬泽语)“从这里,可以触

摸今日中国与文学的心脏”(阎连科语)的好评,更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在理论学界之外受到普通大众的热捧。

如果说《中国在梁庄》的“现象级”炽热,是学界和读者有感于当下乡土文学与真实乡村总隔着一层的“虚假”,而试图将梁鸿的“非虚构”写作树立为某种范式的理论冲动,那么时隔近十年,在有关乡村“非虚构”

收稿日期:2019-09-09;修回日期:2019-09-29

基金项目: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自由探索项目(2019TS101)

作者简介:景兴燕,女,河北邢台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写作已普遍同质化,且失去“先锋效应”的今天,是时候掠去塑造范式的感性冲动,来对其做一番理性的考察。《中国在梁庄》中的乡村图景足够真实吗?还是包孕着经过梁鸿——一个乡村的“外来者”视域过滤后的乡村想象?

一、“外来者”身份的建构

“外来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经典的人物类型。“带有现代文明背景的‘外来者’,因为各种原因、怀抱各种目的,进入到一个相对封闭自足的稳定空间,在目睹和经历了一系列的事件之后,他们又退场离开。”^①在以现代性为主潮的20世纪,这一封闭自足的空间大多以与现代对峙的“乡土”形象出现,这也从本质上规定了,“外来者”故事中会有现代与传统、外来与本土、城市与乡村等的对峙。现代文学之父鲁迅便率先将理性批判的锋芒投诸于中国的乡土之上,塑造出第一个“外来者”形象——《故乡》中“冒着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的“我”,并通过启蒙者“我”的思想之光烛照出古老乡土上老一辈儿女沉默的生与死。作为“外来者”形象的渊薮,鲁迅《故乡》中的“我”有某种质的规定性:带有启蒙目的、作为他者进入乡村、不见于本地文化、有深深的隔膜感;在形式上则呈现“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叙事模式,叙事策略上有“看”与“被看”的情节设置。

在鲁迅之后,“外来者”形象在百年文学史上绵延不绝,且随着不同时代、不同语境变化出不同的样貌:20年代在鲁迅回乡故事影响下的“乡土文学”中,“外来者”以思想启蒙的角色出现在彭家煌、王鲁彦笔下;30年代,“外来者”在以湘西精神造民族人性之魂的沈从文笔下,成为“病态都市人”的代表;40年代解放区文学中,“外来者”以“革命组”“工作队”进驻农村为形式,是图解党的农村政策的代言人;50—60年代的“红色叙事”中,“外来者”常进入到落后地区传播革命要义,是图解中国革命正确性的言说者;而到了新时期,在下乡知青和返乡作家的笔下,“外来者”又成为彰显“人的解放”的文化启蒙者,与世纪初鲁迅笔下的外来者形象遥相呼应。可以看出,不管“外来者”形象怎么变迁,其以外来者身份进入一个相对封闭和固守的空间的姿态贯穿始终。而外来者形象本身质的规定性,即启蒙、文化冲突、文化隔膜,以及讲述模式——“离去—归来—再离去”也无出其右。

《中国在梁庄》的作者梁鸿便是进入乡村的“外来者”。她的成长轨迹与鲁迅影响下的乡土作家几乎如

出一辙。她早年长于乡土,有感于故土的荒凉和逼仄,在成年后“逃异地、走异路”,通过求学实现了身份的转变。离乡二十年之久后,她已是京城进入体制的高校教授,身上最明显的标签是学者。据梁鸿自述,她之所以萌生强烈的“重返梁庄”的意识,一是源于对自我的怀疑:她曾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说过,她对每天站在讲台上高谈阔论、每夜焚膏继晷的读书生活充满了怀疑,甚至认为是与现实相脱离、没有意义的虚假生活;一是源于长期浸淫于乡土文学的科研工作中,有感于当下乡土文学与乡土现实的疏离,在一种近乎责任感的召唤中从书斋走向大地,期望通过田野调查和非虚构的实录呈现真实的乡土,并通过透视乡土在当代社会变迁中的种种驳杂来构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形象。

对于第一个原因,与其说梁鸿是对学术价值和生存意义产生了怀疑,在无根的悬浮状态中生出渴望融入大地的怀乡病,毋宁说是梁鸿对于学者身份、体制内影射的城市文明的一种厌弃和反思。这种厌弃和反思是何其熟悉,它与沈从文笔下流露出的对城市文明的厌恶和对湘西精神的推崇简直惊人的相似。而对于第二个原因,与其说梁鸿是出于科研困惑而寻找突围,毋宁说鲁迅式的知识分子的强烈干预意识和民间情怀,促使她更期望通过农村来完成民族国家的“想象共同体”的构建,从而对现代知识分子所应承担的天然使命与先验职责做出一种回应和担当。

无论从哪一个向度来看,梁鸿出走梁庄后再归来都带有明确的目的。且这一目的,在仍以“现代化进程”来衡量发展程度的乡村文化来看,都有明显的“异质性”。也就是说,梁鸿对自我生存意义的反思,对大地不能割舍的恋情,对构建真实乡土中国的冲动,是知识分子式的思索,是现代文明的产物,是仍停留于、挣扎于乡土之上的梁庄人所不能理解的“外来文化”。虽然梁鸿一再警醒自己,要避免启蒙视角,放弃各种成见,要让梁庄说,让梁庄人说,这种自我警醒显示了她身为学者的自觉批判意识,以及对在其他作家笔下一度失语的农民主体性的张扬,但“知识分子无论如何的平民化,都具有某种精英意识,在大众面前以启蒙者自居”^②,这是梁鸿难以摆脱的身份困局。这一困局为文本中出现的梁庄主体性经常让渡于作者主体性的诟病埋下了伏笔。

事实上,作为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作为鲁迅研究专家王富仁的学生,梁鸿对鲁迅作品及其启蒙意识非常熟悉,然而她确在文本中多次致敬了鲁迅的《故乡》,比如她本人重回故乡、离开故乡的行程是典型的

“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比如她时不时感受到的来自村庄人的“不理解”、文化冲突,以及不自觉的启蒙意识,这是知识分子出身的梁鸿所同样不能摆脱的思想渊薮。因而,当梁鸿一厢情愿以“农家之女”身份进入梁庄时,其“知识分子”身份总以压倒性优势将原生身份遮蔽,而她自己则身不由己成了那个预设的、带着“批判的、略显伤感的”^[3]、某刻高扬着启蒙理性之光的“外来者”形象。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中说“视角蕴涵着小说的价值体系和各种态度的集合”^[4],也就是说作家选择何种角度言说世界,体现着作家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主题意义。梁鸿不能摆脱的“外来者”身份,使其言说下的梁庄,成为“外来者故事”中阐释现代与传统、外来与本土、城市与乡村等对峙因素的最佳话语场,而这也同样为梁鸿以非虚构方式讲述梁庄故事,却留下“剪裁性”“预设性”“阐释性”等口实埋下了伏笔。

二、外来者的审视:梁庄的被剪辑

梁鸿自述,在面对梁庄时,她有意坚持哀伤的审视。她认为:“忧郁、伤感、郁结、凝聚、怀念,与真实的事物和情绪本身已稍有距离,有间隔,有审视的意味。”^[5]这说明梁鸿期待在一种有距离的审视中完成对梁庄客观的非虚构呈现。作者面对故土带有感情,是最自然不过的常理,问题是,为何梁鸿选择了哀伤,而这哀伤又在文本中起到什么作用,是否真如作者所说可达到有距离的审视,这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

笔者通过查阅梁鸿幼时资料,得出这样一个认识:梁鸿选择“哀伤”视角审视梁庄,与其说是出于知识分子式的民间同情,毋宁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囿于幼时生活困苦的经历造成的先验印象。弗洛伊德认为:“在所谓的最早童年记忆中,我们所保留的并不是真正的记忆痕迹而却是后来对它的修改。这种修改后来可能受到了各种心理力量的影响。因此,个人的‘童年记忆’一般获得了‘掩蔽记忆’的意义。”^[6]童年的遮蔽记忆一方面使她阔别故乡二十年之久后再次面对梁庄时,先验的感情立场自动生成成为“预想的悲伤、痛苦、无奈”,^{[7]247}一方面在远离人世的、永恒的、曾经解放了她少女天性的梁庄自然天地面前,又表现出对家乡过往生态的“溢美”之词。当这双重的复杂情感裹挟在知识分子特有的批判理性精神之下,即通过审视梁庄完成当下中国“想象共同体”的构建时,梁鸿几乎自然而本能地选择了“问题视角”,即在发现梁庄的问题、梁庄的苦痛中对梁庄进行了她心目中的“剪裁”。

《中国在梁庄》的谋篇布局暴露了这种“剪裁”,“显

示着作者先验的知识谱系和理论视野”^[8]。文本共有8章内容,在这8章里,很多梁庄人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向社会发出了真实乡村的呼声。建坤婶子那被王家少年强奸了的八十二岁的老母,那给孙子又当爹又当妈的想以命换孙子命的留守老人五奶奶,那因为思念在外打工的丈夫而患了“花痴病”喝下农药自杀的留守妇女春梅,那生活贫困把家安在墓地里的坤生,好容易娶上媳妇但媳妇又跟人跑了的姜疙瘩,维护村庄道义却处处不讨好的梁光正,信神着魔不顾家的灵兰……梁庄人以自己的口讲出的真实,的确令当今通过虚构文学了解中国现实的读者看到了不一样的切肤之痛。显然,梁鸿深谙通过“这一个”来捕捉整体痛点的叙事伦理。然而,对许多有乡村经验的读者和研究者来说,他们则似乎并不买账。有论者称:“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常常产生幻觉,觉得读的不是梁鸿笔下的人物,而是我们村子里对应的人……也许城里的读者会感到新奇,我则是感同身受、莫逆于心,就像这部作品是我自己写出来的一样。”^[3]这多少说明梁鸿的“这一个”是带有普遍意义的、能发现问题并表达问题的“这一个”,多少是经过选择的“病灶式”人物。因而,这一个个梁庄人的真实被顺理成章为8章内容,来分别言说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的宏大问题:环境污染、留守儿童教育、留守妇女的性问题、外出农民工出路、留守农民出路、农村宗教信仰、文化建设等问题。这使得“整篇文章就像一本‘中国农民问题大全’”^[3]。概括和提炼问题的能力显示了梁鸿宏阔的理论视野,然而正因为太“合适”了^[3],太“整饬”了,使得文本“感觉平滑了些,顺畅了些”,少了一些实录感的杂芜和自在,多了一些人为的设计和剪裁感。正如有论者所说:“作品里虽然有许多梁庄人在说话,但他们的声音常常被有意识地裁剪而归纳到某一类的问题里。他们的讲述仿佛只是在证明某一种问题的存在。”^[9]

这种发现“病灶式”人物的问题意识,从梁鸿以外来者姿态进入梁庄时便天然地规定好了。费孝通《乡土中国》认为乡土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这也就是说发生在乡土之上的人和事,对于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是敞开的,他人的故事并不私密。然而,就现实来说,外嫁的姑娘却因为空间位置的位移排除在外,更遑论离家二十年之久,嫁入城市的学者梁鸿?故而梁鸿进入梁庄便需要一个当地人的引领,且这引领确需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帮助她完成有效度的采访。从文本中可知,这个指引人有父亲、姐姐,而为了在规定的而不是自在的时间内完成有效度的表达,熟知梁庄人事的父

亲和姐姐在潜意识里自会安排合适的人来完成采访。什么样的人合适呢?从简单层面来理解,可用“苦难”二字来概括,故而可以看到在梁鸿笔下,梁庄似乎成了一个问题的发现场、病灶的诞生地。但是,“简单化的苦难叙述,很快就形成苦难的情节陷阱,反倒是一种修辞上的遮蔽。”^[3] 果不其然,这一问题意识使得梁鸿在亲近故土时,总先验地着意于故土向“恶”的变化并保持批判姿态,如儿时戏耍的坑塘变为黑色的淤流,乡村生态遭到破坏;而对于故土向“善”的变化却较少关注,即便关注了也总流露出一不恰当的“不满”,例如村民盖起的新房,她以“不伦不类”来称之,新修的道路,她以阻碍了两村的交流来描述,对于村民对新农村政策的感谢,她以“中国的农民是最容易满足的”^{[7]246} 来概括。这一问题意识显然凸显了梁鸿作为外来知识分子的思索姿态和“本该如此”的启蒙意识,这使得她一再秉持的“让梁庄说”的原则被遮蔽了,那些体现“梁庄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和彼此间的动力影响”^[10] 的闲笔也被排除在外。有论者就此委婉批评作者对梁庄过于强大的控制力,“从文本的表现力而言,让人物或者一草一木来说话,比作者自己说更有说服力。”^[3]

与此同时,有论者也发现,指引人——父亲梁光正和整个梁家是那么其乐融融,与梁庄其他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梁庄人是那么不同,梁家好像抽离于故事之外,成为了旁观者^[11]。窃以为这一方面是先验的问题意识在作祟,另一方面是在梁家更多自在的观察和参与使梁鸿在面对梁家时,多了多元化的观察视角,而这一优势在面对梁庄其他人时,则只见作者“一次次进入不同村人的私人生活,相反,那些村人却很少进入作者的生活”^[10],因为缺少参与和交流,故而作者只能在问题意识下见到问题。

梁鸿曾说:“我告诫自己要避免以自己的知识体系凌驾于村庄生命和生活之上。”^{[12]77} 她在竭力避免自我的主观意识,期望还原梁庄的主体性,然而在其先入为主的“哀伤”姿态下,在强大的问题意识指引下,梁庄仍难以避免以整饬的、顺滑的“设计感”成为反映当下中国转型期乡村现实的“被剪裁的样本”。

三、外来者的悖谬:梁庄的被逃离

梁鸿抱持寻找自我、再现梁庄两个目的回归故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次指向同一目的地的两个向度能指间的对话,本可以达成同质同构的关系,即在完成再现梁庄的同时,亦完成自我精神的建构。然而,实际文本却凸显着两者的疏离,交织着感性与理性

的冲突,叠加着民间同情立场与理性批判精神的抵牾,这显示了梁鸿非虚构姿态的某种“不坚定”。这种不坚定表现在文本中则是:虽有意呈现梁庄作为主体的声音,却又时时摆脱不掉返乡者先验的情感羁绊;虽有意客观呈现梁庄,却总难以克制启蒙冲动,又在与本土文化的隔膜中,时感启蒙效能的乏力,而终止于清浅的情感宣泄;虽努力弥合梁庄形象的裂隙,但终至失语,只能逃离。

梁鸿为了还原梁庄的“在场感”,照搬了方言俗语、粗话俗话等民间话语,为文本增添了粗粝的质感。她坚信“把乡村感情生活微妙而丰富的存在给展示出来”的“向内转”^{[7]247} 的社会调查方法,是“非常有启发性的”。然而,正因为梁鸿“不但希望体会他们的疼痛和黑暗,还试图准确把握他们的疼痛与黑暗的点位在哪里”^{[7]11} 的使命过于强烈,以至于她作为“外来者”的声音及某种先验情感总跳脱出来,要么与梁庄人的认识形成错位,要么以明显的好恶影响客观,在无形中削减了梁庄的主体声音。

比如,对于强奸八十二岁老人的王家少年,梁庄人言语激愤地以道德感表示痛恨,甚至扬言该“直接枪毙”,而梁鸿却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认为父母的缺失、爱的缺失,让“一个单纯、善良、内向”,“甚至,还有些教养”的孩子走上歧路。她“微弱地提及,他也挺可怜的”,“又试图说中国的死刑好像太多、太随意”,这一番论调,让梁庄人“都很惊讶”。再比如,梁庄人不管走出多远都要回家盖房子,这是世代乡民几千年的造家冲动,其中寄予着最朴素的生活希望,而梁鸿却对建一座缺少人伦温情的“空巢建筑”表示怀疑;对于梁庄某些“声音分贝”高于先验农民印象的个体,梁鸿也不加掩饰地表达了好恶,对在城里卖菜说着蹩脚普通话的堂嫂、在城里踩三轮喜欢显摆的堂哥,对“具有很强的表演性”的村支书,她都表示了微词;而更多情况下,文本中多次出现的“惊呆”“震惊”等字眼,亦是她对梁庄人习焉不察的生活习惯和情感状态的先验式评价。有论者就此提出批评,作者带有明显好恶的先验式评价与不合时宜的错位式理解,与李敬泽批评某些纪实文学“习惯了下车伊始,哇啦哇啦,真理在握,比谁都高明”^[11] 有何区别?

梁鸿对自我声音的僭越有着坦白式的警觉,然而在面对梁庄人漠然的生存意识时,她对梁庄的天然之爱,又促使她忍不住启发和引导。文中有两处进行了详细描写。一次是沙厂淹死了两个高中生,人们哭得伤心欲绝,但谁也不提追究责任,她不禁问道“应该追

究挖沙场的责任,或找河道管理部门问问”,但人们却说“这有啥办法,你找谁,谁会负责?”^{[7]50},甚至责怪都怨娃不懂事。启蒙的乏力让人无奈,让人气愤,使得从小敏感爱哭的梁鸿,在周遭的哭声中“却没有眼泪”,只是“麻木”,“疼痛”,“苦恼”。一次是芝婶五岁的留守孙子要“跳河”,她“反复启发父子分离、家庭割裂、情感伤害所带给孩子的那种痛苦与悲剧感”^{[7]72},但“芝婶总是重复一句话,那有啥门儿,大家都是这样子”。启蒙的再次失效,使梁鸿一度产生了自我怀疑,觉得这一启发“有点卑鄙”。在梁鸿看来,让芝婶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只能徒增痛苦,却依然解决不了留守之殇,正如百年前鲁迅与钱玄同关于铁屋子的隐喻。于是在最需要提供思想建设时,作者无力提供答案,只能反求助于己,质疑“访问者”“参观者”的意义,表现出对启蒙姿态的“不坚定”。

梁鸿在情感和理性之间的不坚定,促使她在更多需要做出启蒙回答的时刻,却选择了以情感式同情代替理性式批判,如对留守儿童,“面对这种已经成为日常状态的分离,他们又该怎么办?天天痛哭、难过?那生活,又该如何度过?”对留守妇女春梅的死,“可是,难道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就没有权利过一种既能挣到钱、又能夫妻团聚的生活吗?”对深度思考的回避,对抒情感伤的高扬,使“文本从沉重处生发,最终却是‘不可承受之轻’”^[11],留给读者的除了裂隙满痕的村庄、廉价的感喟以及“被看”的故事外,文本没有提供理性的引导和指引路径。

隔膜感、无力感使得梁庄压抑而沉重,然而,当一切人事退场,永恒的星空和大地无言地与梁鸿相对时,梁鸿显出了难得的轻松。她几乎用同回忆往昔一样的“溢出”笔法描绘了梁庄之美:静谧的黄昏、宁静的村庄、自在的温暖。一边是问题式的梁庄,一边是自在的梁庄,哪一个梁庄才是真实的?梁鸿亦深感到文本的裂隙,企图用“一种久远的密码,一种民族无意识”^{[7]248}来越过批判、弥合裂隙,自我安慰道,“时代政治、政策及由此带来的变迁只是一个侧面,是暂时的影响,一旦这种强大的外力消失,一切可能又恢复到过去。”^{[7]248}但转而又对自我的观点表示“犹疑,不确定”。而这种不确定,在她无意间表露出反感“北方乡村的厕所”,拒绝自己的孩子同梁庄孩子在肮脏的坑塘边玩耍,她猛然意识到“无法摒弃自己的优越感和城乡生活的差异而带来的某种嫌弃感”^{[7]248}时,变得更浓重。“经过这几个月深入肌理的分析与挖掘,故乡在我心中已经变得面目全非。”^{[7]267}于是,在一种近乎“无

限羞愧”又“如释重负”的矛盾中,梁鸿只能“逃跑似的匆匆”^{[7]244}离开了梁庄。

四、结论

诚然,《中国在梁庄》以非虚构姿态,在虚构文学描述乡村乏力的当下,呈现了贴近真实乡土的可贵和努力,“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一向沉默的农民形象终于摆脱了‘被说’的他者地位,”“第一次发了声”^[13],他们言说下的乡土“是如此真实,又如此残酷”,“读之令人触目惊心”^{[7]5},然而,作为外来者,梁鸿难以摆脱的知识分子宿命般的精英意识以及“苦难焦虑症”^[13]的问题意识,使梁庄在凸显作为“这一个”的自我困境的同时,又难以避免充当反映当下中国转型期乡村现实的“被剪裁的样本”。尽管文学批评家的身份赋予梁鸿警惕性的自觉和坦白,但其“农家之女”底色之上的知识分子反思,在强烈的使命冲动下,充当了一种强势的外来文化,有意无意将梁庄放置于被审视的位置,从而使文本交织着民间同情立场与理性批判精神的矛盾,而又因无力提供启蒙策略,终至于使梁庄变成裂隙满痕、“面目全非”的乡村想象。

〔参考文献〕

- [1] 代璐.论“五四”至30年代“外来者故事”的叙事形式和主题思想[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11.
- [2] 林贤治.国民性批判问题的札记(节选)[M]//林贤治《沉思与反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 [3] 李云雷.《梁庄》讨论会纪要[J].南方文坛,2011(1):79-91.
- [4] 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胡苏晓,周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86.
- [5] 梁鸿.呼愁与哀痛[J].青春,2013(1):25-27.
- [6] 沈闪.从涪陵到梁庄:比较视野下的“非虚构”中国叙事[J].文学评论,2019(7):193-198.
- [7] 梁鸿.中国在梁庄[M].成都:天地出版社,2017.
- [8] 刘帅珂.现代农民之女的心路历程[D].沈阳:沈阳师范大学,2019.
- [9] 张莉.非虚构写作与想象乡土中国的方法——以《妇女闲聊录》《中国在梁庄》为例[J].文艺研究,2016(6):14-22.
- [10] 杨俊蕾.复调下的精神寻绎与终结——兼谈《梁庄》的非虚构叙述旨向[J].南方文坛,2011(1):96-98.
- [11] 陈桃霞.单向度的叙述——论《中国在梁庄》兼及叙事伦理[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9):48-51.
- [12] 梁鸿.艰难的“重返”[M]//历史与我的瞬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 [13] 孙元元.在“坦白”与“沉默”之间——关于乡村非虚构叙事中的两重虚构[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11):168-180.

〔责任编辑 李兆平〕